

北京专史集成

主编 王 岗

北京城市生活史

本书主编 张艳丽

 人 民 出 版 社

北 京 专 史 集 成

主 编 王 岗

北京城市生活史

本书主编 张艳丽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城市生活史 / 张艳丽主编 .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6

(北京专史集成 / 王岗主编)

ISBN 978-7-01-016799-2

I . ①北… II . ①张… III . ①城市—社会生活—历史—研究—北京

IV . ①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9188 号

北京城市生活史

BEIJING CHENGSHI SHENGHUOSHI

丛书主编: 王 岗

丛书策划: 张秀平

本书主编: 张艳丽

责任编辑: 张秀平

装帧设计: 曹 春 马 龙

人 民 人 民 社 出 版 发 行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刷装订: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23

字 数: 4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16799-2

定 价: 7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 (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北京专史集成》课题组成员

总 顾 问：王学勤

总 策 划：周 航

主 编：王 岗

特聘学术顾问（以姓氏笔划排序）：陈高华、陈祖武、林甘泉、曹子西、蔡美彪、戴 逸

名誉顾问：崔新建

执行策划：王 岗、吴文涛、刘仲华、章永俊

编委会主任：李宝臣

编 委：王 玲、尹钧科、阎崇年、王灿炽、吴建雍、于德源、李宝臣、孙冬虎、袁 熹、王 岗、吴文涛、郑永华、刘仲华

分卷主编：（见各卷）

课题组成员：王 岗、尹钧科、吴建雍、于德源、李宝臣、袁 熹、邓亦兵、孙冬虎、吴文涛、郑永华、刘仲华、张雅晶、赵雅丽、章永俊、何岩巍、许 辉、张艳丽、董 焱、王建伟、程尔奇、高福美、靳 宝

课题组特邀成员（以姓氏笔划排序）：马建农、邓瑞全、李建平、宋大川、宋卫忠、杨共乐、赵志强、郝志群、姚 安、黄兴涛、韩 朴、谭烈飞

丛书主编：王 岗

本卷主编：张艳丽

本书撰稿人员（以姓氏笔划排序）：王 岗、王建伟、
许 辉、张艳丽、赵雅丽、高福美、董 焱 靳 宝

编写说明

2006年，历史所在北京市社科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北京专史集成》作为院内重大课题立项。8年来已经出版了12部专著。这些专著是在全所同事的共同努力和所外专家的大力支持下陆续编写、出版的，并得到了从事北京史研究同行们的认可。

谭维克院长在主持社科院工作之后，对已经出版的12部专史给予了充分肯定，并鼓励历史所的同事们继续坚持这一有着一定学术价值的研究工作。于是，我们将已经出版的12部专史编为“第一辑”，又确定了《北京专史集成》第二辑新的12部专史书目，并得到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领导的大力支持，再次把《北京专史集成》第二辑列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我们在此深表感谢。同样，《北京专史集成》第二辑的出版也得到了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负责编辑工作的专家们的大力支持。我们在此也深表感谢。

在《北京专史集成》课题立项之后，我们特别聘请了一批著名历史学家作为课题的学术顾问，他们为专史第一辑的撰写工作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们在此表示深深的敬意与感激。在专史第一辑的撰写过程中，有些著名专家因年事已高而辞世，我们在此也深表悼念之情。学术研究是全社会的事情，这些年事已高的著名专家在学术上的无私帮助给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树立了榜样，激励着我们做好专史第二辑的研究工作。我们相信，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著名历史学家们的无私帮助下，在人民出版社领导和责编的积极配合下，特别是在全所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北京专史第二辑的编写和出版工作一定会顺利完成。

王岗 于2014年9月

前 言

城市，在今天人们的生活中已经成为无法避免的一个概念，甚至乡村，也有了进一步城市化的要求。城市和乡村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而在人类文明的发祥时期，城市正是从乡村聚落中脱颖而出的。而当一个城市越来越脱离乡村，也就有着更多的独立性，并开始产生对一个区域的支配地位时，表明这座城市的文明发展程度已经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

最初城市里人们的生活与乡村里相比尚无太大区别，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功能的逐渐完善，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相比，差异就会越来越大。这种差异的产生，除了城乡之间的差别之外，社会地位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人与人之间尊卑、贫富差异的分别越来越大，人们在生活状况方面的差距也就变得越来越大。

在北京地区，有考古发掘证明的城市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三千多年中，城市发生了巨大变化，房山琉璃河的燕都被蓟城所取代，而蓟城在发展到辽南京城时又被金中都取代。随着金朝的灭亡，中都城又被元大都所取代，而元朝灭亡后，明朝又对大都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造，从而形成了新的北京城。清朝入关，使北京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城市的发展变迁状况，直接影响到城市中居民的生活状况。

城市状况的变迁，是一种客观环境的变化，有着特定的规律，对城市居民的生活当然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例如城市形制的变化，从封闭状态转变为开放状态，就北京城而言，这种转变是伴随着城址变迁而实现的。在金中都城里，城市的形制大致还维持着汉唐以来的封闭式坊里制，居民区和商业区都被高大的坊墙阻隔开来。及元大都在金

中都东北重新建造一座都城时，就废除了坊墙的阻隔，使都城由封闭状态转变为开放状态。

有的学者认为，从封闭的金中都到开放的元大都，是城市经济发展繁荣的结果，是经济的力量冲破了封闭。这种说法的参照物是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但是，金、元之间的朝代更替与宋朝的都城发展完全不同。如果元朝的统治者是汉族帝王，那么这种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变或许会有经济的因素在发挥作用。但是，元朝的统治者是蒙古族帝王，他们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后，并没有放弃久已习惯的游牧文化的生活方式，因此，这种城市开放性的出现，应该说更准确的是游牧文化的体现。

由此又可以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即北京城市里的居民在几千年之中也曾多次发生变更，有的变更非常大，显然不是自然的变更。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在北京开始成为都城之后的事情了。北京第一次成为都城是辽南京，身份是四座（最初只有两座）陪都中的一座。这时虽然不是因为朝代更替，而是类似的情况。当时辽太宗支持石敬瑭夺得后晋皇权，石敬瑭则把幽州城割让给辽朝，又被辽朝升为陪都南京。

辽朝是由北方契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把幽州升为南京之后，自然会把大批契丹民众迁移到这里居住，从而在城市生活中带来了大量的游牧文化因素。而在这种城市生活的状况下，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有了进一步的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了新的城市生活风貌。

此后金朝崛起，灭辽、灭北宋，占有燕京，特别是金海陵王迁都到这里的时，将大批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女真族民众也迁移到这里定居，极大地改变了城市居民的民族成分构成，带来了更多女真族的文化特色。虽然女真族与契丹族一样都是少数民族，但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却有较大差异。契丹族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后，在很长一段时期仍然保留着游牧文化的生活习惯。而女真族在东北地区生活时，就是以农耕与渔猎相混合的方式，因此，早在入关前就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汉化”。这种“汉化”的过程在女真贵族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之间就基本完成了。

因此，从金熙宗到海陵王，在金朝的上层就开始推行比较彻底的“汉化”，到海陵王迁都以后，更是加快了“汉化”的进程。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在城市生活中也有所反映。如海陵王在扩建金中都城时，就是以北宋东京为蓝本的，完全是一种逼真的模仿。其他如服饰、饮食、居住等各个生活方面，皆是如此。

到了元代，都城的居民再次出现较大变动。随着元朝把这里定为

都城，大量少数民族民众，从政府官员到军队士兵，从手工工匠到域外商贾，有许多人都迁移到这里定居。从而再次改变了都城的居民构成状况。而这种状况的改变，又直接影响到城市生活状况。因为元朝统治者和辽朝统治者一样，也是长期维持着游牧文化的生活习俗，故而使得都城中的城市生活再次形成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融。

元明之际，在朱元璋北伐军的冲击下，元顺帝逃往漠北草原，带走大量少数民族民众，而朱元璋又把剩下的元朝官员迁往南京，大都城为之一空。此后明朝政府往北平地区大量迁移民众开垦屯田，朱棣定都北京之后，又从山西及江南等地迁移富户定居在此，使得北京城的居民生活中又增添了江南文化的特色。这种变化，使得北京的城市生活减少的是游牧文化，增强的是农耕文化。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

明亡清兴，北京的城市居民结构再次发生巨大变化。清朝定都北京，大量八旗子弟随同清朝统治者进住北京，整个内城都被八旗子弟占据，城市生活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一座北京内城就变成了一座大军营，随之而来的内城生活也变成旗民生活。其他原有居民和外来居民皆被排挤到外城（又称南城）居住，从而形成了内外两城差异极大的两种城市生活。随着两城之间的居民交往日益频繁，两城之间的生活差异也在逐渐消失。

从清代中期开始，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变化，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北京首当其冲，在城市生活中也有明显的体现。西方文化随同军事侵略、经济掠夺一起来到北京，使之在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开始产生由小到大的影响，有些学者称之为“近代化”进程。从城市建筑到各种生活设施（如自来水、电灯、电话），从服装服饰到餐饮食物，等等，都出现在北京城里。当然，也少不了洋使臣、洋兵、洋教士，等等。这些新来的居民，给北京的城市生活带来了许多新的元素。

清朝政府被推翻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发生巨大变化，但是，对北京的城市生活影响并不大，整个城市仍然沿着“近代化”的轨迹在向前行进。直到民国迁都南京，北京失去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以后，才对北京的城市生活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这时的北平仍然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这是保持这座城市继续“近代化”的生活动力。文化的惯性比政治的惯性要缓慢得多，因此，北京的城市生活也仍然维持着惯性。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占领北平，在这里推行奴化教育。但是，中

华文化的宏大精神已经在广大民众心中扎根，因此，这种奴化教育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持续了8年，这个时间的跨度在政治、军事方面已经不算太短了，但是在文化方面的跨度却形同一瞬间。随着日寇投降，北京的城市生活又回到了“近代化”的轨道上来。时隔不久，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建立，北京的城市生活也进入一个新时期。

纵观北京的城市生活，2000多年来，城市居民在不断变换，城市生活也由此而不断变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种城市生活体现出来的最大特点就是宏大的包容性，四面八方的、国内国外的，不同的人们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却都融入到北京这座城市之中，时至今日，北京包容的不同文化范围更加广阔，内涵更加丰富，更加能给北京的城市生活带来新的色彩。

我们历史所的同仁在近20年前曾经合作编写过一部《北京城市生活史》，这部书今天已经很难找到了，而许多曾经参加编写工作的同仁也已经逝去（如姜纬堂、于光度两位先生）。但是，学术仍然在不断发展、创新，所里又增添了许多新的科研骨干，我们对北京城市生活史也有了新的认识，仅以这新的科研成果来纪念已逝者。

王岗

2016年8月

概 述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一种居住方式。有了城市，人们的生活状况也随之发生变化，开始出现更高层次的生活状态。北京城市何时源起，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考古发掘的材料还都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考古工作者们在房山区琉璃河发掘出来的西周燕都遗址应该是目前所发现的北京地区最早的古城遗址。从遗址的状况来看，燕国的统治者在攻灭蓟国后迁都于蓟城，而使燕都遭到废弃。这个过程，始于三千多年前燕都的建造，而何时迁都到蓟城，还有待于研究成果的进一步证明。

蓟城在变为燕都后，随着燕国的不断发展而带来城市生活的逐渐繁荣，成为整个华北地区最重要的都市之一。此后，秦灭六国，推行郡县，蓟城就变成了一座军事重镇，作为中央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一道屏障。这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主要是军人和他们的家属，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隋唐五代时期。接下来，是由游牧民族建立的辽朝从后晋石敬瑭手中得到幽州，并提升为辽南京，这时城里的居民中，增加了许多的少数民族民众，城市生活面貌也发生了变化。

此后，金、元两代相继在这里定都，金中都是半壁江山的首都，而元大都则成为一统天下的首都，这种飞跃再次使城市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城里的居民越来越多，城市生活越来越丰富。到了此后的明、清两代，这里依然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城市生活的发展繁荣又超过了金、元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清代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在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同时，这里的城市生活也加速了近代化的进程。此后，清廷的灭亡、民国的迁都，皆对这里的城市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这部《北京城市生活史》就是研究这段历

史进程的结果。

一、北京城市生活史研究的意义

一座城市的产生、发展，以至于衰亡，就像一个人的生命一样，都是一部生动的历史。城市规模的由小变大，城市建筑的由简变繁，城市经济的日益发展，都和生活在城市内外的居民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北京作为屹立在华北平原上的一座都会，经历了从产生、发展到兴盛的过程，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还有进一步的远大前程。

而与这座城市的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居民们的城市生活。一座城市如果没有了居民，就是一座死城，很快就会消亡。由于有了居民们的生活，才会产生城市文化，这座城市也才有了灵魂。北京城市之所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众多民众在创造着灿烂的文化，并使这种城市文化不断延续，不断创新，不断发展。

但是，这座已经有几千年生命的城市究竟是如何经历了风风雨雨，走过了怎样的艰辛路程，住在这里的居民们又经历了哪些悲欢离合，成功与失败，有许多东西仍然处在未知状态。这样一部灿烂的历史，在漫长的历程中留下的不仅是成就，也有沉重的经验教训。今天的北京还要进一步发展，居民们的生活还要进一步改善，因此，通过深入的历史研究，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对今后的发展会产生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北京城市生活史研究的对象

北京城市生活史研究的对象，一个是城市，一个是居民。作为城市，它是居民生活的先决环境。它的存在，决定了居民的构成，有什么样的城市，就会有什么样的居民。城市的定位在不断发生变化，城市中的居民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城市的地位在国家中的定位，会随着国家的盛衰有所不同，而国家与国家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关系的变化，也会造成城市地位的变化。

作为北京地区最早的城市之一的蓟城，最初只是一个部落或方国的都城，这种都城在中华大地上数以万计。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益激烈，蓟城变成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的都城，像这种规模的城市已经不多了，它开始影响了华北和东北的许多地方。及历经秦、汉直至辽、金，这里的影响不断扩大，来到这里的居民数量越来越多，居民成分越来越复杂。到了此后的元、明、清

三代，这里的影响已经遍及全国。我们研究的这座城市，就是要搞清楚城市的变迁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作为一座普通城市和作为一座都城，对居民的生活影响是不一样的。

作为北京这座城市而言，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民众数不胜数，他们的生活也是极为丰富的，最初作为一座北方的军事重镇，这里居民的生活是比较单调的，没有更多的色彩。而当这里成为都城，特别是成为全国首都之后，这里居民的生活就变得丰富多彩，其丰富的程度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城市。这种居民的丰富生活是由都城提供的特殊服务。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同生活、相互融合的大家庭，而这种民族融合在都城表现尤为突出。北京在成为都城之前，很早就是多民族共同居住的一座城市，特别是它位于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的交界处，就更加便利了众多民族相互融合的进程。这也是它最终发展成为全国都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同民族的民众，都有着自己的生活习惯。当他们来到北京城的时候，也同时带来了他们独特的生活习惯。而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许多少数民族民众的生活习惯都融入到众多汉族居民的生活之中，逐渐被同化。如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他们的服饰及审美观念，他们的饮食及起居习惯，都在逐渐消失和改变，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北京居民的生活习俗，这种生活习俗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

北京城在成为都城之前，就是一个人口流动比较频繁的城市，主要是农耕民众与游牧民众之间的相互往来。这里在成为都城之后，更是全国民众频繁往来的地方，都城所特有的吸纳及放射功能不断把全国各种人士纷纷吸纳到这里来，又不断把各种人士分散到全国各地去。这些人有的在北京生活几个月，或者一两年，还有些人则在此生活十几年、几十年，甚至终老于此，定居于此。

最早的北京城（即蓟城），除了黄帝的后裔们在此居住之外，先后有西周召公奭的子孙、以游牧为主的山戎部落民众，以及后来的匈奴、乌桓、鲜卑、契丹、奚族、女真等大量少数民族民众都曾经定居在这里，他们的共同生活使得民族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失了，共同成为中华民族中汉族的主体民众。此后的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民众也曾经大量生活在这里，在生活习俗等方面也很少保留有民族特色，特别是满族，几乎完全融入了汉族之中，只是在姓氏和身份上略有区别。

这些千百年来融入北京城市生活的众多居民，他们就是北京城市生活史加以研究的主要对象。

三、北京城市生活史研究的内容

北京城市生活史研究的内容，是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无数居民的生活历程，主要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类。就物质生活而言，又可以分为士、农、工、商的生产活动和衣、食、住、行的生活等两类活动。就精神生活而言，则可以分为文化教育、宗教信仰，以及岁时娱乐等几项活动。

在先秦时期，士、农、工、商被称之为“四民”，即四个最基本的社会分工门类。其中，士既是指知识分子，也是指军人，故而士有六艺，其中的射、御就是与战争相关的技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军人逐渐成为一种职业，才从士中分离出来。农在先秦时期也不仅仅指农业生产，还包括了纺织业生产，所谓的“男耕女织”，才是一个完整的农业家庭。而在北京城里居住的居民中，大多数的妇女仍然要从事纺织生产，已经成为家务劳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可知，在北京城市的居民中，不仅没有缺少军士，也没有缺少农妇。这两类人的活动都是城市生活史的主要内容。

至于工匠和商人，最初是没有独立身份的，自古即有“工商食官”的制度。也即是说，手工业工匠和商人的活动最初都是受到官府控制的，有的工匠和商人甚至没有独立的人格。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工匠和商人的活动逐渐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一种正常的职业。而这些人的活动，也就成为北京城市生活史需要研究的另一项主要内容。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两类活动有时又结合在一起，构成著名的老字号，其模式则是前店后厂，后面从事手工业生产，前面负责商业销售。

在中国古代，士的地位是居于“四民之首”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士大夫阶层，他们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来为统治者管理国家，再往后，则有大量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来获得进入政府、管理国家的行列，由此又形成了都城中的一种新事物——会馆的出现。士子们在会馆内外的活动，构成了北京城市生活的一大特色。

因为在古代的城市中，居民基本上都是住在坊里中的，故而经商的商市也是被设置在专门的坊里中的。在北京城市的发展进程中，坊里制度的废除是在元代的大都城，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商市才从坊里中被解放出来，并出现在大街小巷等各个地方。商人们的活动构成了城市生活的又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自元代以来的庙会活动不仅为居民提供了便利的商业贸易，而且也带来了十分丰富的民俗活动，产

生了新的城市文化。

就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而言，文化教育应该被放在首位。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重视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传统，中华文明才得以千百年来传承不绝，延续至今。在成为都城之前，这里只有一些简陋的地方教育机构，在培养城市内外的青少年们。而在成为都城之后，这里的文化教育有了质的飞跃，不仅有了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有来自全国各地最优秀的教师和众多最优秀的学生，本地居民的弟子则成为少数。在中央教育机构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地方教育机构也在不断发展，教育质量也在逐渐提高，从而在整体上改善了都城居民的文化层次。

即便是北京在成为都城之后，文化教育状况已经有了极大改善，但是，能够受到教育的居民子弟仍然是少数。从辽南京建有太学开始，这里的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官学就基本完备了，但是，这些官学能够容纳的学生只有少数贵族和官僚的子弟，大学和府、州、县学所收录的学生，只是全部居民子弟中的极小一部分。虽然在坊里、乡镇还设有无数的私塾和其他教育机构（如社学、义学、驿学及书院等），也无法做到让大多数居民子弟都受到教育的程度。

在宗教信仰方面，北京地区和全国各地一样，城里的宗教场所很多，前来拜神诵经的人也很多，但是如果问他们信仰何种宗教，甚至问到他们拜的宗教偶像究竟有何神灵时，人们往往无从对答。这就是中国古代，也是北京古代城市居民们的宗教信仰状况。人们不论进的是佛寺还是道观，是天主教堂还是清真寺，拜谒神灵的心情是虔诚的，许愿也是善良的，但是，他们确实没有唯一的宗教信仰，即唯一信奉的神灵。

在古代北京居民的眼里，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之间是有矛盾冲突的，然而这种宗教冲突和居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不论是佛教高僧还是道教大德，他们在宗教上的追求也和居民们在伦理道德观念上的追求完全不一样。如果宗教派别宣扬的教义和人们生活中的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冲突，被灭掉的只能是宗教的教义。因此，除了中国本土产生的道教之外，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都有一个适应中国国情的过程（即有些人说的“汉化”过程）。在北京是如此，在全国各地也是如此。

岁时娱乐活动是最能够体现城市居民生活状况的地方。从元日（今春节）到元宵，从端午到中秋，上自宫廷，下至百姓，都沉浸在欢乐庆典的活动中。如京城百姓，以往的辛勤劳作到了岁时佳节都停止

了，人们要穿最漂亮的衣裳，吃最香甜的食物，因为放假，许多平日很难遇到的亲朋好友相聚在一起，从事他们最喜爱的活动。而宫廷中的帝王和政府中的大小官员，平时政务繁忙，而到了这时也会放松一下。在通常情况下，岁时佳节就是举国同庆的时候，人们在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显然，阔人有阔人的乐趣，穷人也有穷人的快乐。

人们对这些岁时节令赋予了美好的愿望，元日为一年之始，人们都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有对新生活的改善。端午虽为“恶日”，人们也采取各种方法避凶趋吉（如喝雄黄酒，佩五彩符等）。而“中秋”月圆，则代表着人们对合家团圆的情感追求。又如元宵节的放花灯会，端午节的赛龙舟，是广大民众在岁时节令中的集体活动，识与不识之人的交流，只是通过特定的文化途径，也使之成为城市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

以上这些内容，都是北京城市生活史应该加以研究的。一座城市，只有建筑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生活在里面的人，与城市相比，居民更加重要，有了人的地方就会逐渐形成城市，而一旦没有了人，城市就会变成废墟，变成遗迹，有的遗迹会很快从世界上消失。只要有了人，才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文化才会不断传承，不断发展变化，从过去走到现在，再从现在走向未来。

四、北京城市生活史的阶段划分

就整个北京城市生活史的发展而言，要加以研究，就要在时间跨度和空间范围上加以界定。在空间的界定上，问题比较简单，我们的研究范围，重点是在北京城的范围内，适当对城外的相关区域加以关注。但是，在时间跨度方面，却有着不同的选择。其一，是时间跨度的长短，特别是研究的截止时间定在哪里？往前溯，可以从北京出现城市的时候开始，也就是时间跨度的起点。较难处理的是时间跨度的终点，是放在清朝的灭亡，还是新中国的建立，亦或是改革开放后的30年。我们按照大多数“北京专史”的体例，把这部城市生活史的截止时间定在新中国建立。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北京，城市生活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值得研究，但是，我们希望留给后人去作出更加客观的评价。

在时间跨度确定之后，阶段划分就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里，也有几种选择，第一种方法，是按照古代、近代、现代的体系加以划分（因为当代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不在此列）。这种划分是按照社会性质的不同发展阶段来进行的。第二种方法是按照朝代的变更

作为划分标准。如先秦时期、秦汉至隋唐时期，辽金时期、元代、明代、清代、民国时期。这种划分标准是在许多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中都被采用的一种方法。第三种方法是按照北京城市发展的变化作为划分标准。如诸侯国的都城、北方军事重镇、少数民族政权陪都、割据王朝首都、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等等。

这三种阶段划分的方法各有优劣。第一种方法从社会性质的角度出发，更强调理论认识上的一致，从古代到近代和现代的发展，确实有着比较清晰的脉络，在对许多历史现象的把握方面也有便利之处。但是，由于不同作者对社会性质的认识往往不一致，就很容易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不同的观点，产生矛盾。这部著作既然是集体研究的成果，就应该尽量减少矛盾的地方。

第三种方法是从城市发展的角度出发，也有其优势的地方，就是人们的城市生活确实与城市定位的变化密切相关。北京的城市生活史在这座城市变成都城前后的差异确实十分明显。但是，北京作为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时间很长，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而在这漫长的时间跨度中，元代、明代和清代又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城市生活内容，如果不加以分别研究，是很难准确把握各个不同朝代的特点。因此，我们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法。

这部北京城市生活史共分8章，也就是把北京城市生活从古代到现代划分为8个阶段。其中的前3章并不是每个朝代一章，而是把相类似的朝代合并在一起，加以研究，从第四章开始，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城市的政治地位有了极大提高，城市生活日益丰富，其影响也變得越来越大，才使得每个朝代都有了单独加以研究的必要。而其中的第六章和第七章，虽然都是清朝的北京，但是从清代中期开始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是有必要分别加以研究的。

换言之，就研究对象而言，北京城市生活是同一个主体，而三种阶段划分方法也有相同之处。就第一种方法而言，本书的前6章是古代部分，后2章是近现代部分。就第三种方法而言，本书的第一章是诸侯国都城及向北方军事重镇转变时期，第二章是北方军事重镇时期，第三章是从陪都向全国首都的转变时期，第四章至第七章是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时期，第八章则是从全国政治中心转变为普通城市的时期（仍然保留了文化中心的地位）。阶段划分的选择，只是希望能够使我们的研究成果更加客观、准确。